



扫二维码 看大学视界

教育国际化究竟是什么

■本报记者 陈彬

杨锐的第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是用中文写成的。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刚刚硕士毕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锐来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跟导师说,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想写高等教育国际化。导师觉得这个话题很好,但杨锐自己却有些不踏实。他担心等他的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国际化”这个话题可能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事实证明,杨锐当年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直到20年后的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依然有着太多的话题可以讨论,而且“相较于20年前,国内外的形势都变了,这种变化又使得国际化的方式甚至定义都发生了改变”。

不久前,已经身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的杨锐参加了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的“活力·特色·共赢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在这场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杨锐一起讨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国际化究竟是什么?

一份榜单

为了组织好这场论坛,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教授闫月勤已经奔波忙碌了多日。对于闫月勤来说,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浓缩进一份榜单中的,这就是由她负责编制并在本次论坛上发布的《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URI-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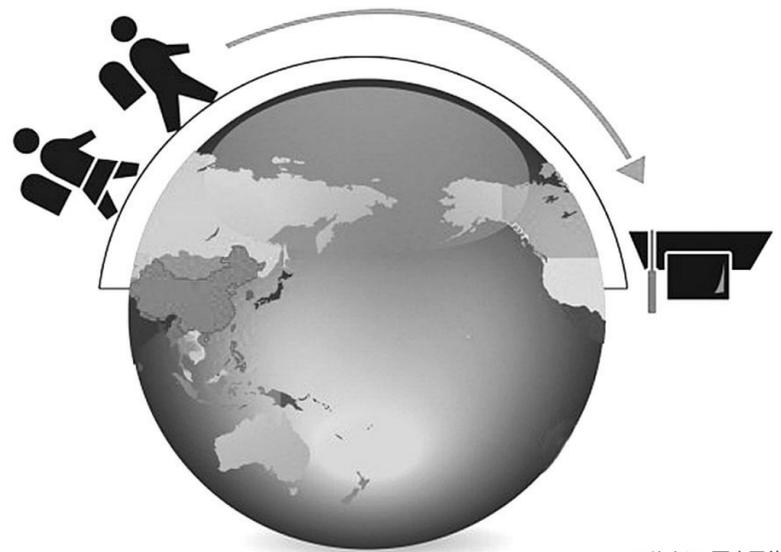
闫月勤领导课题组开始对国内高校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排行是在2013年,今年发布的已经是他们编制的第四份榜单了。几份榜单相互对比,的确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总体而言,国内高校国际化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化,依然是‘985工程’大学好于‘211工程’大学;东部地区大学好于其他地区大学;北上广大学好于其他城市大学。”闫月勤说,比如今年排行榜的前十名全部是“985工程”大学;9所高校地处东部;其中又有6所高校来自北京和上海。

必须承认,高校间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事实上,近年来国内高校对国际化工作也的确是越来越重视了。在调查中,研究团队发现几乎100%的样本大学已经制定了本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一半以上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具有国际化视野;几乎所有高校都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明确的国际化要求。

然而,与此相对的还有另一组数据。“闫月勤调研中,我们向参与调查的100多所高校询问是否拥有外文选课系统。最终,只有19所高校填写了‘有’。”闫月勤说,他们还查询了115所样本大学的校园网外文网站建设情况,包括学校外文网站、管理部门外文网站、二级学院外文网站的情况。最终结果显示,有93所高校拥有外文网站;22所没有,其中3所高校则直接跳转国际外网。在93所拥有外文网站的高校中,有19所高校在2016年没有给网页作过任何更新。

“国际处是大学管理部门中,最主要的外文交流窗口,但在参与调查的高校中,只有47所高校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的国际处是有外文网页的。”闫月勤说。我们在编制庞大的国际化战略的时候,是否首先应该静下心来,做一些更具体的工作呢?

一种融合

对一所高校而言,最基本,同时也最具体的工作,无疑是为学生上好每一门课。因此,国际化在教学方面的直接体现便是课程的国际化。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贝蒂·里斯克一直在从事课程国际化方面的研究。在她看来,所谓的课程国际化,其实就是将国际跨文化在全球的维度下进行合并,将其放入课程的内容中,并在学习成果评估、教学方法以及学习专业所需要的支持服务中体现出来。

“比如护理学专业,国际化的课程不应仅仅教给学生如何专业地工作,还要让他们知道如何护理不同文化背景的病人。因此,我们需要从本科教育和学历教育入手,在课程的设计中纳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里斯克说。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化的课程提供的不应该仅有“不连贯的个人活动”。换句话说,课程国际化不应该仅仅包括针对部分学生的留学和交换工作,即使是针对这样的工作,其重点也不应该是仅仅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他们如何和当地的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及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校园当中。“我们不能只招聘一些国际教学人员,让他们用英文进行教学,这可能有用,但远远不够。”

对于里斯克的观点,香港城市大学助理副校长程星深以为然。

“在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生交流的工作中,

将重点大多放在了项目的管理上,但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本地生和国际生的融合交流问题。”在发言中,程星表示,即使我们吸引再多的外国学生来到学校,但如果只是把他们放到留学生楼里,让他们“自娱自乐”,那么,我们其实什么成果都没有得到。“当外国学生来到学校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创造各种机会,让本地学生和他们产生交流,只有相互之间产生交流,才会有真正的接触与融合。”

一个选择

事实上,“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到学校”正是负责国际招生工作的程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度过的。有时,搭乘国际航班的程星也会在飞机上问自己,每天如此“折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想来想去,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为了学生服务。”他说,因此在高校的国际进程中,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

在程星看来,目前很多高校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便也要做什么。但事实上,一个学校的战略规划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在使用之前想清楚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国际化战略也不例外。

“对于高校而言,国际化战略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大类——走出去和请进来。前者是把学生送出去,让他们去做交换生;后者则是更大力度的国际化招生。”程星说,但正是因为学校资源的有限,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侧重,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对此,程星表示,如果高校本身资源相对丰富,并且更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去,那么可以将资源

丢掉知识“喂养” 促进“教学相长”

——南开大学“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改革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通讯员 郝静秋

89名学生围坐在9张圆桌前,分别就《骆驼祥子》一书中祥子的命运进行深度探讨。100分钟后,当下课铃声响起时,大家还在激烈“争吵”,久久不愿散场。

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现代中国文学小班讨论课的一幕,也是任课教师林晨梦寐以求的上课效果。

今年,南开大学启动了一场“课堂改革”,在数字电子技术、有机化学、现代中国文学等11门课程中试点“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新模式,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学习质量。

这种有别于以往的新教学模式,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新的体验和收获。

互动的“过程管理”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模式是将传统的教学分为两部分,“所谓‘大班授课’,就是知识的集中讲解和分析,‘小班讨论’则是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南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蒋雅文解释称。

现代中国文学被选为试点课程后,文学院组成了以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为总负责人,以两位教师、10名助教和两名顾问为主体的团队。在进行新的教学设计时,他们决定在大班以讲授历史和文学史为主,教学的另一重点——文本分析,则在小班讨论环节开展。

89名学生随机分成10组,每组随机分配一名助教。在讨论课上,每个学生都要进行3—6分钟的观点性发言,并至少回应两名同学的提问。整个过程中,助教只作引导和追问,把控讨论节奏。

小班讨论要求学生每周至少要读两三百页的高深度阅读量。在问题设置上,不仅要有学术意义,还要引起大家讨论的兴趣。所以,学生们讨论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和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等著作中的情爱与死亡;用秦晖、李泽厚的两种相左意见分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据林晨介绍,教学改革后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期末考试(40%),小班讨论(35%)和期末时以小组为单位的文献分析(25%)。

其实在学生们眼里,林晨的课一直都是非常精彩,常常在大家的掌声中结束。但他对这样的课堂依然感到遗憾:“老师不是演员,学生的赞美和掌声固然弥足珍贵,但这不是衡量教学效果最主要的指标,学生的收获和成长才是。”

实行教学改革后,学生们通过查阅文献、广泛阅读等逐步培养起“问题意识”,在小组讨论中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提高了学习兴趣,林晨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教学不仅仅是学习的过程,更应该是激发学习的过程。学生自己对学科的兴趣,好奇被激发起来,他们所学会远多于教师所讲。”

自觉的“深度学习”

从秋季学期开始到现在,现代中国文学一共进行了6场小班讨论。近三个月的时间,从志忘到期待,89名学生不约而同地对这门课给出了好评。

“以前,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知识,几乎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曲幽说,“但现在有了小班讨论课,我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想法,并和其他观点进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认同、质疑甚至反对,这就迫使我下课后要继续阅读,补充自己。”

她的同学聂亚芳也对此深有感触:“我们没有对与错的批判,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对的、错的或是偏颇的,都会得到包容。我们在知识体系的构架上不断修剪、补充、提升,而且这种成长不是老师灌输产生的,是我们自己填充的。”

在讨论课上,林晨选择了圆桌面面对面的形式鼓励学生们发言。班上有个叫郝可欣的学生,以前不善于表达自己,但自从第一次发言后她发现:“原来我讲得挺多的,不少同学都觉得我讲得

有道理。”经过6场讨论,她充满了自信,现在总能侃侃而谈。

记者在讨论课上发现,每个学生的身边都放着一沓厚厚的材料,有用来参考的学术论文,也有自己的读书笔记,上面写满了他们的观点。“这门课不允许作空洞发言,每个人都努力用文本中的细节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深入阅读,有时候光写提纲就要六七个小时。”有的学生不禁“抱怨”起来。

林晨对此却十分高兴:“当学生花时间读书、思考或与其他同学‘叫板’时,就不是那种考前‘临时抱佛脚’的状态了。通过思考、提炼,能力就会不知不觉地‘长’到他们身上。”

另外一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试行“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改革的数据电子技术课,学生能力的提升有着更加直观的表现——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发生了变化,高分率明显上升,不及格率有所下降。“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是课上从没讲过,学生也没见过的设计题,需要他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用最简单的电路解决问题,结果很多学生都给出富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教授孙桂莹说。

滋长的“教学野心”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使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转变:教师由“主演”变成了“导演”,学生由“观众”变成了“主演”。这种转变提升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兴趣,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讲教师对问题的设计,讨论中的引导都需要深入思考,教师在教学方面需要倾注更多精力。”蒋雅文说,“教学方式的变化,更加有利于双向激发、教学相长。”

多放在组织学生出国交流方面;反之,如果认为自身资源有限,不能够支持大部分学生的出国交流,那么最好选择到国外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一个国际生的到来,很可能影响周围一群本土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在四年中没有真正出国,但他们与外来学生的接触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化。”

在发言中,程星还提醒说,高校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家庭收入问题。“很多大学其实都遇到过一个,如果你送一个学生出国,那么学生的花费有多少是大学的钱,多少是父母的钱呢?事实上,学生的花费大部分还是来自家庭。因此可以说,‘走出去’更多的受益人是高收入家庭,‘请进来’则更多地会使低收入家庭受益。”

一套体系

对于所谓的学生交流,杨锐也有自己的看法。“当前从高校的角度看国际化,更多地是看交换生的数量,或者有多少科研项目。但国际化对中国来讲,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文化,是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价值体系。”他说。

对于很多人而言,中国高校的国际化的一个“很美好”的过程,至少这个过程并不痛苦,但杨锐并不这么看。

“从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之日起,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便是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下完成的。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国家的高校中,其身体(运行管理系统)和灵魂(文化价值体系)是分裂的——身体是西方化的,而灵魂却是东方的。在这方面,即便是香港高校也不例外。”杨锐说。

西方的组织结构和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价值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这也导致了非西方国家高校在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服务时,效率远低于西方国家。也正因此,在杨锐看来,非西方国家国际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建立一套属于本国的新知识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可以让国人得以安身立命。”

长期以来,杨锐一直在作这方面的研究,而他在研究中,也的确发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迹象。

“具体而言,当你考察东亚地区的一些顶尖高校时,你会发现,即使某些助理教授在对西方的知识范式相当熟悉的同时,也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一定的把握。”杨锐曾经访谈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的一位副教授,在访谈中,这位副教授一方面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西方主要学者在本专业领域的主要观点,同时,对于自己的社会也具有非常强的使命感。

“学者能对本土社会有关注、有了解,同时对西方社会也非常熟悉,这种现象只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好的大学中才相对普遍。事实上,也只有在对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建立起一套新知识价值体系的可能,才能让这里的学者慢慢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杨锐说,国际化的确是我们长期的希望,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忘本国文化,并将两者结合形成最强大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使命。而当这种迹象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促其进一步发展呢?

中国大学评论

“范式”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这一概念作为库恩科学哲学的核心,其定义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大体而言,构成一种范式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采纳的一般性理论假定和定律,以及应用这些假定和定律的技术。范式是一个科学的核心特征,是确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关键。范式是某种“客观存在”,无所谓好,无所谓坏。

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传承范式的过程。与范式的持续深入学习相联系,笔者个人创造出一个衍生概念:范式陷阱(paradigm trap)。学生在既有旧知识范式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多、掌握愈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可能会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这就是范式陷阱。范式陷阱与佛学中“所知障”概念内涵相似,就是个人所知会构成其认识和创造新知的障碍。金庸先生的《侠客行》就是一部武侠寓言,描述所知障中极致的“文字障”。

范式陷阱存在于个人认识层面,相对范式而言是主观的,构成了个人以及进入范式陷阱的群体完成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以及创新式巨大障碍。袁隆平先生大学期间与同班同学一起学习“新遗传学”课程,那些毫不怀疑、深入、精确学习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陷入了“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而带有怀疑精神的袁隆平只考了63分,他就十分侥幸地没有在认识上陷入这个范式陷阱。范式无所谓好坏,但范式陷阱则会成为个体和群体创造性(creativity)的制约。对范式陷阱概念的反思剖析,其目的就是使得袁隆平当年的“侥幸”能够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基本认知,并以此反思我们的观念和教育制度,比如“状元招生”和“强化”基础。

王家卫先生耗时十年的电影《一代宗师》是影视艺术展现“功夫范式”陷阱的集大成之作。剧中武学宗师之一宫二小姐——宫二小姐是掌握家传六十四手的武学大家,但为了报仇、除去汉奸奸师马三,她不得不推掉婚事、入道、发誓终身不嫁不投徒,才能以武功亲自与马三决战,最终,宫二小姐取胜但受到严重内伤,并于花甲年华逝去。那么,宫二小姐为了杀汉奸(国仇)和杀父仇人(家仇)马三,为何要推掉婚事、入道、发誓终身不嫁不投徒呢?因为马三和当时的武林都认为这是规矩。剧中马三说,“宫家的东西至金至贵,要娶,必须得是宫家的人。你是许了亲的人,没资格”。第二,宫二小姐为何不用枪呢?用枪打死汉奸在功夫范式之外的吃瓜群众看来没有任何问题,但宫二小姐宿命般却绝不会采用“子弹范式”去解决马三。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宫二小姐在认知上陷入了功夫范式构成的范式陷阱,成为这部电影引发观众感动和唏嘘的主要悲剧性人物。

心理学家考克斯(Catherine Cox)在特罗曼指导下,曾经对100多名历史上杰出创造者进行研究,其结论是:那些后来取得杰出成就的年轻人,其特征包括极高的智力,长期坚持的内在动机和持续努力,对自我能力的自信以及性格中的力量。《一代宗师》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剧中的武学宗师宫二小姐、宫二小姐和叶问,按照以上创造性标准看,智力高超,内在动机明确坚持,无疑具有创造潜力并且也都在武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例如宫二小姐就联合了通背、炮锤、太极、燕青等十几个门派加入中华会。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是什么样呢?战争是什么样呢?当我们很多潜在创造性精英仍在功夫范式中沉浸时,1932年日本海陆空三军有飞机2000多架,早已建立起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三菱重工、川西飞机、川崎航空都已经成为飞机设计、飞机制造领域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公司;日本自己制造的航空母舰已经能够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在中途岛展开航母对决。当我们想由乌克兰进口“瓦良格号”改建的中国航母辽宁舰,就会疑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巨大的差距。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再次审视《一代宗师》,将这部电影与描述海战的电影《虎虎虎》《中途岛海战》、描述欧洲坦克战的电影《狂怒》一起比较去看,也许会发现一代宗师的悲剧绝不仅是几位陷入功夫范式陷阱中的武学宗师的悲剧了……

《中国青年报》2015年6月报道,直到2014年2月,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才在制训训练计划时砍掉了“头开红砖”“钢钉穿玻璃”“咽喉顶钢筋推手”等课目。2015年1月,海军某陆战队才将“手断砖”“身断木棍”等10多项中看不中用的课目取消,把更多时间用在远距离狙击、直升机训练、低空跳伞、机枪射击课目上。功夫范式是否构成一个范式陷阱呢?在功夫范式中不断强化基础、加强基础,具有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呢?

按照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创造力潜能的人才很多,但在哪个范式中工作似乎非常重要。被功夫范式陷阱所局限,那么创造力只能发挥在功夫范式之中,于大时代的影响有限。功夫范式是否构成一个范式陷阱呢?在功夫范式中不断强化基础、加强基础,具有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呢?

当下,范式陷阱概念仍存争议,是以需再论。

『一代宗师』的悲剧与范式陷阱

■卢晓东